

《长安图碑》新考*

李芳瑶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知永兴军吕大防(1027-1097)在北宋京兆府(唐代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主持绘制完成《长安图碑》和《三宫图碑》。《长安图碑》包括两部分内容:图像和题记。图像为汉和隋唐长安城、北部禁苑和南部山川,题记为吕大防对汉唐长安城的简述和评论。《三宫图碑》是对《长安图碑》上三宫(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部分的放大。北宋去唐未远,吕大防在唐代韦述《两京新记》和当时尚存的“长安故图”的基础上,实地勘察长安旧地,故《长安图》保存了关于唐代长安的重要资料,历代关注汉唐长安者多引述图碑内容。然两碑皆在战乱中毁佚,直到近代,两碑残片在西安地区出现,学者们由此开始了新一轮对图碑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近代著名书法家和收藏家邵章是收藏《长安图碑》拓片数量最多的藏家。邵章(1872-1953),字伯炯(亦作伯璩、伯綱),有文集《倬龠遗稿》。他的一套拓本为日本元史研究者前田直典获得^①,有残片22^②,于二战中焚毁,平冈武夫根据照片和曾经刊布的图片重绘了《长安图》^③。然而,邵章还有两套拓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基于北大所藏邵章拓本,重新讨论《长安图碑》的相关问题,兼及对《三宫图碑》的讨论。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隋唐长安社会文化的研究”(09BZS009)成果之一。其写作得益于随荣新江老师、妹尾达彦先生参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邵氏拓本,在此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的胡海帆和汤燕老师。

① 前田直典在西安获得此图,拓本上有“桥西邵氏父子欣赏记”和“伯璩所得嘉拓”。详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年。中文译本名为《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② 福山敏男:《唐长安城的东南部—吕大防长安图碑的复原》,《古代学》第二卷四号,1953年,第288-300页,收入作者《中国建筑と金石文の研究》,中央公论美术,1983年,第185-202页。本文主要参照收入《中国建筑と金石文の研究》的文本。福山敏男记有21片,应是少数了题记中的一个小片。

③ 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第35-44页、图版二。

一、邵章拓本概况和得图因由

邵章将两套拓片中的一套裱糊连缀,下文称为裱糊本。该本有拓片 22,其中图 15 片,包括北部宫苑(12 片)和分散的城南山川(3 片),裱于一幅纸之上,题记(7 片)裱于另一纸。图和题记旁皆有邵章题字,图的题字是五言诗一首,内容为:

三月岁甲戌,我见唐官图。云自长安来,得者何乐夫。兴庆整纸外,太极石一隅。字画未昭晰,东绌而西馀。厂市帖估至,丛拓一束俱。检之获廿石,大防名可呼。殚心缀成幅,官禁形萦纡。城北半在目,殷殷旧皇都。兴庆既兀峙,大明尤奔趋。东西两内苑,回旋龙首渠。名坊存二十,王侯骈新居。城南韦杜曲,梗梓谷不孤。画师记张佑,题字石苍舒。今翳旧藩署,昔矗京兆庐。隋文一字内,规制为唐模。官市间巷间,棋布而畦区。坊有墉有门,无地容奸逋。再传惜无道,乃为李氏驱。好文撰图说,详略吕未符。意其据志补,弗克窥石摹。金元兵劫炽,奇迹沦荒芜。何代拾残砾,付之毡蜡徒。少启逐复闕,著录无专书。幸兹片石出,不款脱本疏。寻枝宜讨原,断肘希完肤。敬告陝人士,勤搜莫踟蹰。^①

题记旁题字云:

长沙叶鞠常昌炽《语石》十“残石位置一则”云:“余曾得吕大防长安志图残石,石苍舒书,仅存七片,首尾残缺,潜心钩索,迄未得其原次”云云。此跋石亦存七片,原次甚易榫合,或尚有图石杂其中,故不可次也。

邵章另一拓本是一套未经裱糊的散拓。此拓本较裱糊本多出 1 片,为城南泮水和清明渠。宿白先生是两套拓本的最早研究者,他提及散拓和裱糊本合校,“可补考古所、前田两拓处甚多,如大明宫部分之‘东内苑’、‘皇帝殿’、‘九仙门’,城外之‘清明渠’、‘东交河’、‘龙骧谷’,最重要的是吕大防《图说》的位置,在‘汉都城’的上方,即长安图石刻的左上隅”^②。由此可知,若将北大藏邵章拓本发布,图上的图像内容可帮助推进《长安图》和汉唐长安研究者甚多。

甲戌岁即 1934 年。邵章在裱糊本《长安图》的题诗中提到得图之因由,即

^①诗收入邵章《倬齋遺稿》,文字稍有出入。

^②宿白:《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文物》2001 年第 1 期,第 62 页。该文注 9 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亦藏有邵章拓本一套,即引文中所谓“考古所”藏拓本。目前为止,对《长安图》原貌进行推测复原的研究者有福山敏男、平冈武夫、周铮。福山敏男在《唐长安城の東南部》一文中主要讨论长安城东南曲江池的位置。平冈武夫在《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中拼合了《长安图》残碑拓片,为研究使用《长安图》带来极大方便。周铮《吕大防长安图碑和三宫碑》收入曹婉如主编的《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文物出版社,1990 年)。他们三人都认为题记在图的下方,北大拓本推进了对题记位置的认识。

“云自长安来，得者何乐夫”。此句事关《长安图碑》和《三宫图碑》残石近代在西安出土的情况，下文对此稍加简述。

1922年10月，陕西省署修葺时发现《颜勤礼碑》^①，当时出土坑中还有碑石数块，但是没有继续发掘。1934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帮助陕西省建立陕西考古会^②，在《颜勤礼碑》出土地继续发掘，得到石碑一块，绘有大明宫南部城门部分和兴庆宫全部。负责人为国立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何士骥，即邵章题诗中的何乐夫。他和友人夏小欣又在西安南门内小湘子庙街水沟中发现一块残石，绘有太极宫和皇城南部部分及周边坊市^③。陕西考古会成员张鹏一确认两石为北宋吕大防所制《长安图碑》和《三宫图碑》^④。考古会发掘出土的图石比例较大，来自于《三宫图碑》，名之《唐大明宫残图兴庆宫图》；何士骥在水沟中拾得的残石比例较小，来自《长安图碑》，名之《唐太极宫暨府寺坊市残图》^⑤。两石后人藏西安碑林^⑥。

在陕西考古会发现两块残石之前，《长安图》已见金石收藏家叶昌炽的《语石》（宣统元年初刻）记载，卷五提到“宋吕大防长安志图已佚，近新出土残石数十片，余尝从西估得拓本，离合钩贯，不能得其斗筭之处。”^⑦卷十又有：“余曾得吕大防长安志图残石，石苍舒书，仅存七片，首尾残缺，潜心钩索，迄未得其原次，乃知古人精诣为不可及。”^⑧邵章推测叶昌炽所得不只是题记，还有图石拓片。这说明早在考古发现之前，《长安图碑》残片已流散于文物市场。

1936年刊印的《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一“唐西内太极宫图”和“唐南内兴庆宫图”两条专门介绍新出土的残石：“按吕氏唐宫原刻有总分图，俱为保经堂夏氏所藏。拓本总图石断裂凡七段，仅前图太极宫较完好。此图兴庆宫乃分图之一，亦完好。”“又汉故城并有拓本二段，画石人、马之类，疑亦吕刻，然

①杨娟：《〈颜勤礼碑〉复出后诸事记略》，《碑林集刊》第二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30页。

②国立北平研究院：《本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经过》，《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五卷第四期，1934年，第67-76页。

③何士骥：《唐大明兴庆及太极宫图残石发掘报告》，《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五卷第四期，第53-61页。

④张鹏一：《唐大明兴庆两宫图残石跋文》、《唐太极宫图残石跋文》，《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五卷第四期，第62-65页。

⑤何士骥本人亦完成《石刻唐太极宫暨府寺坊市残图大明宫残图兴庆宫图之研究》一文（《考古专报》第一卷第一号，北平研究院，1935年，第1-74页），讨论两碑相关问题。他的研究，才真正将《长安图碑》带入近代学术的讨论。

⑥陈忠凯编著：《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线装书局，2006年，第14页。

⑦叶昌炽撰，柯昌泗评，陈公柔、张明善点校：《语石 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第341页。

⑧《语石 语石异同评》，第562页。

太残缺,故不采。”^①其中保经堂夏氏可能为与何士骥一起寻得图石的夏小欣。此“汉故城”二段的确是《长安图碑》的一部分,数量和邵章拓本的汉故城部分相同。《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未言城南山川,拓本此部分应是邵章新见。《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还提到“惟末行工张佑画、李甫、安师民、武德成^②十二字下刊泐”,属于题记内容,唯不知数量有多少。

综而述之,邵章拓本包括1934年3月从何士骥处得到的《唐太极宫暨府寺坊市残图》一片,以及从“厂市”(应为北京琉璃厂)得到的“丛拓一束”。中山大学亦藏有何士骥赠陈寅恪先生的《唐太极宫暨府寺坊市残图》拓片^③。据此推测,何士骥得到两碑残石后,制作拓片若干,分赠相关学者。

二、《长安图》题记格式推测

《长安图》之上,有一段吕大防本人所做题记,涉及制图用法、参考文献、图碑各部分内容简述、参与人员、制作时间等重要信息。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对《长安图》的记载即摘抄自题记^④,但是缩略了最后一段吕大防对隋唐长安城的评论,此段评论恰好为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转引^⑤,邵章拓本亦保存了题记的最后部分。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复原整理^⑥。本文仅录北大藏邵章拓本存字。据拓本,题记分为上下两栏,行与行之间文字基本对齐,满行14字,上栏结束于“二曰永安渠”,则下栏应始于“导交水自大安坊西街入城”。

①翁怪修、宋联奎纂:《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中国地方志丛书》影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第75-78页。

②“武德成”当为“武德诚”之误。

③此承荣新江老师见告,他从施安昌先生那里得知。

④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第140-142页。下文所引复原后的题记全文均据此。

⑤李好文:《长安志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8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478页。

⑥福山敏男:《唐長安城の東南部》,收入《中國建築と金石文の研究》时有所修改;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第37-39页;杨晓春:《〈云麓漫钞〉中一则隋唐长安研究珍贵史料的校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0卷3辑,2005年,第145-146页;妹尾达彦:《长安:8世纪的都城》,台北故宫博物院“空间新思维——历史舆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8年;妹尾达彦:《都城图中描绘的唐代长安的城市空间——以吕大防〈长安图〉残石拓片图的分析为中心》,收入《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第211-243页。

(前缺)
四十
十步高三
西二门南六门
西有大安宫
在苑内广二里一百
四里九十五步东北
五门西二门
十七里纵三十里东一
五门
广四里纵二里四面各
门东内苑广二百五十步纵
四里九十五步东一门
以渠道水入城者三一曰龙首渠
自城东南导泸至长乐坡酺为二
渠一北流入苑一经通化门兴庆
宫由皇城入太极宫二曰永安渠

上栏前缺后全,存 16 行。存字从“四十”至“大安宫”是对太极宫的描述,全文应作“太极宫城广四里纵二里二百四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五尺东一门西二门南六门”,其中第一行 14 字,第二行起每行低两格,12 字。从“在苑内”至“西二门”是对唐大明宫的描述,全文应作“唐大明宫城在苑内广二里一百四十八步纵四里九十五步东北各一门南五门西二门”,每行均低一格书写。“十七里”至“五门”描述“禁苑”,全文应作“禁苑广二十七里纵三十里东一门南二门北五门”,每行均低一格。“广四里”至“东一门”描述西内苑和东内苑,全文应作“西内苑广四里纵二里四面各一门东内苑广二百五十步纵四里九十五步东一门”,每行均低两格书写。“以渠道水”至“永安渠”拓本所存文字完整,每行低一格。

(前缺)
中开便
青龙寺俗号
开敦化以北四
改之异
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
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
有门通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
民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
也唐人蒙之以治更数百年间
能增大别宫观游之美者矣至其
模之正则不能有改其功亦岂小
哉噫隋文之有国纔二十二年而已
其铲除不廷者非一国兴利后世者
非一事大趣皆以惠民为本躬决庶
务未尝逸豫虽古圣人夙兴待旦殆
无以过此惜其不学无术故不能追
三代之盛予因考正长安故图爱其
制度之密而勇于敢为且伤唐人冒
疾史氏没其实聊记于后元丰三年
五月五日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府
事汲郡吕大防题
京兆府户曹参军刘景阳按视
邠州观察推官吕大临检定
邠州观察支使石苍舒书
工张佑画李甫安师民武德诚铸

下栏前缺后全,存 26 行。自“中开便”至“开敦化以北四”一段全文应作“宣宗修宪宗遗迹于夹城中开便门自芙蓉园北入至青龙寺俗号/新开门自门至寺开敦化以北四/坊各为二”,每行低一格书写。“改之异”全文应作“此迁改之异”,此段回行低三格书写。自“都虽不能”至“其功亦岂小”一段全文应作

“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民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唐人蒙之以为治更数百年间/但能^①增大别宫观游之美者矣至其规模之正则不能有改其功亦岂小”，每行皆满行14字。自“哉噫”起至“吕大防题”拓本所存文字完整，每行满行14字。其后刘景阳、吕大临、石苍舒题名皆低两格。刻工张佑等人空三格，小字书。

根据现存题记文字及格式可以看出，每一文段的上石格式并不统一。对于体现其主观意志的文字，如对隋唐长安城的议论（文末段）顶格处理。对于长安城的客观论述，如水道（龙首等渠）、历史描述（宣宗开便门）等，则低一行处理。唐代的增设，如大明宫和禁苑低一格，东西内苑降两格。平冈武夫注意到吕大防在最后一段抑唐扬隋的评论^②，认为吕大防以春秋笔法贬抑唐代时期才增建的大明宫、禁苑等。这可能是唐代宫禁在书写格式上特殊对待的原因。

此外，如果《云麓漫钞》等书所保存的题记文字完整的话，则上下两栏字数差别较大^③。若以文字较多的下栏来推算行数，应有65行；而上栏文字则远不足65行。考虑到上栏文字包含的段落较多，或许段落间还有空行？

三、关于立石之所

《唐大明宫残图兴庆宫图》的出土地是民国时期陕西省的民政厅，在今西安市北大街以西，北广济街以东，鼓楼以北，西华门以南。此地位置大致相当于唐代皇城中的尚书省。何士骥记录当时发现“全体平铺砖层。砖有纯素者，有带花纹者，字纹者”，“及后清理既毕，乃知为一唐代之建筑地层也”^④，推测该砖层即唐代的地面铺砖。唐代的尚书省至北宋时为何用？据新旧《五代史·韩建传》和宋以降西安地区碑石，唐代昭宗迁都洛阳后，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了便于防守，放弃外郭城与宫城，将原来唐代的皇城改建为新城。辛德勇先生注意到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所载韩建新城之制为“内外二重”，认为韩建不仅改筑新城，而且把新城修为内外二重，以内城作为当时佑国军的衙署^⑤，后来成为北宋京兆府的衙署。韩建所著“内城”就在唐尚书省的旧址上，此“内城”后来成为北宋京兆府衙、金代的京兆府署、元代的陕西行中书省署、明清时期的陕西布政司署，直至民国时为陕西省民政厅。

①福山敏男、平冈武夫复原为“不能增大别宫观游之美者矣”，文意不通，应据辛德勇先生改“不”为“但”。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5页，注释一。

②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第39页

③参考赵彦卫《云麓漫钞》、程大昌《雍录》、王应麟《玉海》和《通鉴地理通释》中引录的题记文字可知，上栏共有639字，下栏则有769字。

④何士骥：《唐大明兴庆及太极宫图残石发掘报告》，第57页。

⑤辛德勇：《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后收入作者《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第200-206页。

对于诸多唐代石刻在此地的出土^①,赵力光认为,是因为这些石碑和《石台孝经》、《开成石经》等一起,都放置于北宋京兆府早期文庙,而当时文庙的地址正是唐代尚书省的西南隅^②。《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的最初放置地点是北宋京兆府早期文庙,以及早期文庙的地址在唐代尚书省的西南隅、北宋京兆府衙署附近,这两点已是研究者的共识。但《唐大明宫残图兴庆宫图》和《颜勤礼碑》是否亦放置于文庙中,笔者有不同看法。

元代骆天骧撰《类编长安志》卷十“石刻”著录《唐张旭草书千[字]文》,转录《复古碑录》曰:“元丰三年,吕大防守雍得之,石苍舒俾模诸石而置于府廨。又得赵大观别本,自‘薄夙兴温情’而下四十六字,乃并刻之。”^③此石刻《张旭千字文》和《长安图碑》、《三宫图碑》有颇多类似之处。两者都制作于元丰三年,都并非真正的唐代石刻,都由吕大防令好友石苍舒绘刻。因此,《长安图碑》和《三宫图碑》更有可能与《千字文》一起摹刻^④,放置于永兴军的衙署,而非京兆府文庙。

早于《长安图碑》出土的《颜勤礼碑》和《马磷庙残碑》存放地也应是永兴军府衙。南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八记:“元祐间(1086—1094),有守长安者后圃建亭榭,多辇取境内古石刻以为基址。此《碑》几毁而存,然已磨去其铭文,可惜也。”^⑤元祐年间确有长安古碑遭破坏之事。元祐年间知永兴军韩缜修灊桥催逼太紧,村民为交差打磨古碑以充石料^⑥。1994年4月,灊河出土古石桥遗址,其中正有唐《马磷神道碑》残石一通^⑦,说明当时确有毁坏古碑以充石料之事。巧合的是,《颜勤礼碑》和《马磷庙残碑》都在北宋京兆府衙署故址附近出现。无论两碑是否由于同一原因在北宋时期遭到磨损,可以确定的是,两碑都在毁坏之后被移入京兆府城中,移入的时间正当或者晚于北宋元祐年间。但

①除了出土《唐大明宫残图兴庆宫图》和唐《颜勤礼碑》之外,清光绪十七年(1891),当时的陕西布政司署还出土了唐颜真卿书《马磷庙残碑》。详参路远:《马磷与〈马磷残碑〉》,《收藏》2006年第11期,第132-133页。

②赵力光:《西安碑林历史述略——兼析西安碑林迁移“三次说”》,《碑林集刊》第八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③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十,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11页。

④据容媛《二十三年(一月至六月)国内学术界消息》(《燕京学报》第十五期,1934,第258页),和《唐大明宫残图兴庆宫图》同时出土的还有北宋文同(据吕大防与苏轼等人的交游圈推测,文同画竹出现在此处很可能与吕大防有关)画竹。这似乎可以说明《长安图碑》和《三宫图碑》并不是单独刻成、立石的。

⑤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85页。

⑥路远:《北宋时期长安古碑的两次劫难》,《文博》1998年第5期,第64-65、83页。

⑦杜文:《灊河古桥址出土唐代残碑略考》,《碑林集刊》第五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85-87页。

是和《颜氏家庙碑》得以放入京兆府文庙^①,从而得到较好保存不同,《颜勤礼碑》的放置地可能因为是京兆府衙署而较易遭到战争波及^②。战乱应是《颜勤礼碑》和《长安图碑》埋于地下的共同原因,《长安志图》转引元代京兆府学教授邳邦用的跋文:“此图旧有碑刻,在京兆府公署,兵后失之。”^③邳邦用所指应是金末情形,不能用作《长安图碑》在北宋放置地点的直接论证,但综合上引材料,很可能《长安图碑》从绘制完成后就一直立于京兆府衙署直到金末。

余论:《长安图碑》的制作原因

吕大防出身关中礼学世家,祖父吕通曾为太常博士,父吕蕡曾任比部郎中。蕡子六,五人进士及第,其中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和吕大临被尊称为“吕氏四贤”^④。吕氏兄弟皆有深厚的礼学背景,他们身为本地人亦对长安史地有深切的了解。何士骥从学术著作的角度理解《长安图碑》的制作:“观宋史吕大防及吕大均、吕大临传,知吕氏兄弟皆为极忠实之礼学家,故言行动作,必多规则,宫室礼志,尤所注意……此皆吕氏兄弟行事切实,好为图谱,不事空疏之证,则其作唐宫室图刻之于石以垂永久,亦意中之事耳。”^⑤辛德勇先生将吕大防制《长安图碑》与关中本地的石刻文化和北宋的“兴学”联系起来,认为关中的刻石和仁宗庆历以来的文化风尚是《长安图碑》制作的社会文化背景^⑥。妹尾达彦先生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分析,认为吕大防制《长安图碑》正值北宋中期恢复唐王朝文物制度的复古运动,这场复古运动的背景是西北党项西夏和北部契丹辽国势力的兴起,以及他们与北宋在唐朝继承者的正统地位上的争夺^⑦。

①王昶《金石萃编》卷一〇一载:“自唐室离乱,其碑倒于郊野尘土之内。更虑年深,为牧童稚叟之所毁坏。且夫物不终否,能者即兴。有都院孔目官李延袭者,真好古博雅君子也,特上告知府郎中,移载入于府城,立于先圣文宣王庙。……时太平兴国七年(982)八月廿九日移”(《石刻史料丛书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67年,叶三十一)。

②民国宋伯鲁作《颜勤礼碑》跋,将《颜勤礼碑》和保存于碑林中的《颜氏家庙碑》对比:“《家庙碑》立于建中元年(780),仅隔一岁(《颜勤礼碑》立于大历十四年(779)),二石皆在长安。而一隐一显,岂亦有数存乎其间耶。”笔者认为,《颜勤礼碑》和《颜氏家庙碑》之所以“一隐一显”,正是因为两者在北宋时期的放置地不同。

③李好文:《长安志图》,第478页下栏。

④《宋史》卷三四〇《吕大防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844页。传中提到兄弟四人“相切磋论道考礼,冠昏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

⑤何士骥:《石刻唐太极宫暨佛寺坊市残图、大明宫残图、兴庆宫图之研究》,第69-70页。

⑥辛德勇:《说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燕京学报》新28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44页。

⑦妹尾达彦在《长安:8世纪的都城》中第一次提到,在《都城图中描绘的唐代长安的城市空间》中再次强调。

然而,以上意见讨论皆没有深入讨论《长安图碑》附带的文本——吕大防为《长安图》所作的题记。在叙述完汉唐长安的历史沿革之后,吕大防以一段意见十分强烈的评论作为结尾。“隋氏设都”,“唐人蒙之以为治,更数百年间,但能增大别宫观游之美者矣,至其规模之正,则不能有改,其功亦岂小哉”,吕大防对于唐朝的贬抑之意表露无疑:“予……爱其(隋文帝)制度之密而勇于敢为,且伤唐人冒疾,史氏没其实,聊记于后。”吕大防似乎更想用《长安图碑》昭示隋代都城的功绩。除了隋唐两代的比较之外,吕大防还提到一个更遥远的名词——“三代”,即“惜其(隋文帝)不学无术,故不能追三代之盛”。“三代”在北宋时期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①,考虑到吕大防身为礼学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题记中的评论似乎可以放入一个更大的语境之中理解。然此事牵涉到北宋前中期的政治文化和士大夫的思想、艺术实践活动,篇幅有限,此处不作深入探讨,但希望本文能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①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对北宋的“三代论”作了专门的讨论。他认为仁宗时期,士大夫开始在“三代”理想的号召下提出对文化、政治和社会进行大规模革新的要求,神宗熙宁变法亦是以“回向三代”为思想背景开始的(三联书店,2004年,第185-186页)。